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何以副刊

从副刊出发

尹学芸





世间的很多事,经常有一言难尽之感,面对报纸副刊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位从蓟州调出的领导给我发来张图片,是当日报纸副刊的内容。他在市里工作,理论上比我先看到当天的报纸。当时我很感动,不是因为自己的作品见报,而是有人在跟我一样关注副刊,这种感觉很温馨。每周四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我周围便有很多朋友,以能在副刊上发表作品为荣。

在我有限的接触里,有几个地方的副刊让人难忘,广东有“花地”,上海有“夜光杯”,北京有“五色土”,天津有“文艺周刊”和“今晚副刊”。“文艺周刊”能整版发一篇小说,这在别处不多见。有那么几年,“文艺周刊”是我唯一能接触到的与文学有关的内容。在看报纸都是奢侈的年月,我有亲戚在引滦工地上班,攒了许多期周四的《天津日报》拿到我家里,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不啻为雪中送炭。后来工作在这方小城,接触到了更多与报纸相关的人,也听闻了更多的故事。

山里乡镇的一位文学青年,每周会在固定的时间,在外面的岔路口等邮递员,就为了第一时间看到副刊版面。“不看就睡不着觉。”认识之后,他对我说。我没有告诉他,我从读高中时第一次往外寄稿就是这种状态。学校是清一色的红砖瓦房,房舍之间是甬路。邮递员老吴骑着绿色的自行车进校园,停在教职员工办公室前,便有老师接过那一沓报纸和信件。我在几米远的地方观望,期待他喊出我的名字。可惜的是,不管是退稿还是发表,这种情形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报纸副刊因为及时和便利,始终让人有一种亲近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读者广泛关注和喜爱。上世纪80年代,我在县志办工作,每天下午都有固定时间在会议室看报纸。当时,几乎人手一张报纸,最吸引目光的还是副刊。遇到心仪的文章大家会一起讨论,还有人悄悄把报纸收起来或用小剪刀剪下来。那时,收集报纸文章是风尚,厚厚一摞剪报本都是“财富”。报纸副刊的风格与文学杂志不同,更贴近现实生活,也更能直抒胸臆,既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窗口,也更能体现时代风貌。

上世纪80年代末,我的小说《一个叫素月的女人》就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后来被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我因此被邀请去外地交流,主题就是怎么给副刊写稿。前几天,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贴出了当年拍的合影照片,是在海边一艘废弃的轮船上,这让我非常感慨。转眼过去三十几年了,那时大家还都很年轻。电视剧的外景地选在了蓟州东部山区,剧组住在渔阳宾馆。天气凉了,每人发了一件军大衣。当时一个电影剧组也住在这里,饰演男主角的是郭振清先生,他声若洪钟,开口即笑,让人印象深刻。我办公的地方就在这个院子里,有时去剧组探班,主演程安娜很有特点,很符合我的想象。但电视剧在央视播出那晚我却没敢看,也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

有一段时间,创作就像遭遇了“鬼打墙”,怎么也理不出头绪,自己也很灰心。著名诗人冯景元先生对我说,给副刊写些稿子吧,换个赛道,也换下心境。这话我听进去了,至今都觉得受益。第一篇写给“今晚副刊”的稿子是《女人之约》,编了一个小故事。后来把文字融入日常,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叙述语境和表达方式。那时我住在山脚下,每晚去登山,掰着手指头数素材。能发表的地方少,我就先把素材当故事记下来,免得忘掉。特别感谢“今晚副刊”的李淑芬女士,在我困难的时候接纳了很多稿子。有一次开会见到蒋子龙老师,他说我的短文“俏皮又有些哲理,很耐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后来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遍地都是野芹菜》,其中很多文章都是在“文艺周刊”和“今晚副刊”发表的,还荣获了第十届冰心散文奖。也有的成了我日后的中篇素材,为我某一阶段的大量书写奠定了基础。比如,《纪念公园1972》先是发在副刊上,后来连篇名也没变,成就了一部中篇。这个特殊的年份连缀着一系列人物和故事,蕴含了某种乡村政治。细节和感受都记下了,就不容易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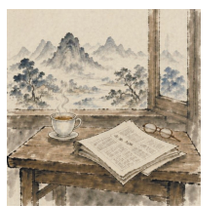
每个人的成长路径各有不同,我觉得自己是从副刊走出来的。其实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年轻时的点滴积累,能成为动力和砝码,鼓励人一路走下去。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磨炼的过程,尤其是文字,需要一点点“磨”。记得在一篇文章中看过,几位作家碰巧走进一间窝棚,里面糊满了报纸,大家便仰头寻找自己的名字,还真有人找到了。这里传达的信息既有趣,也耐人寻味。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场景,在山里废旧房屋的墙壁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有人问,会觉得凄凉么?不会,我摇头。私心里想,一辈子如果只写报刊文章,人生反而是幸福的旅程。写短文就像休闲,特别让人愉悦。我在写完一部小说以后,会快速调整状态进入这种模式,悦己又悦人。时下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倡导的是一种人人可表达的权利。这是我的理解。

今年6月,江苏作家代表团来津。闲聊时,谈起报纸副刊,著名作家毕飞宇说,他当年也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发表过小说。这个话题让我很感兴趣。2004年3月11日,“文艺周刊”的“全国小说名家新作巡展”栏目,刊发了毕飞宇的小说《怀念妹妹小青》。二十几年前的文字,不知他收录进了哪本书里,我很想找来读一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纸页间的岁月

黄桂元



翻开一份报纸,最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永远是头版新闻,那些重大消息,无疑是报纸骨架和躯干的支点。再看版面设置和内容编排,有人会以为副刊只是报纸的“补白”,发一些新闻之外的“边角料”,如小散文、随笔、诗歌、札记、杂感等,寂寂无闻。但如果回望百年中国报刊史便知,这实在是莫大误解。

时下,日常阅读已逐渐被短视频取代,那么接下来,谈论一张报纸的副刊,首先会面临一个问题:副刊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答案必然是肯定的。

自清末《申报》的《瀛寰琐记》随报附送开始,中国报纸副刊已走过一个半世纪。百年间,报纸编排已逐渐形成固定格局,即新闻占据“潮头”位置,副刊则居于报纸末尾,但谁也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副刊虽居末尾,起到的却是某种“压舱石”的作用。举凡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几乎都能在报纸副刊找到原始印痕。

尽管人们常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挂在嘴边,新闻的时效性也确实具有“招客”的先天优势,但热度过后,便有了副刊一显身手的“用武之地”。副刊潜隐于报纸深处,不显山不露水,烟火与世态共存,情趣与哲意并置,赋予报纸温润动人、启智醒脑的内核,自带“留客”的深厚底蕴。百余年时光流转,媒介环境历经更迭,报纸副刊的独有魅力依旧不曾消散。若论报纸副刊往昔的繁盛,《申报》副刊“自由谈”可为典型一例。1932年底,年轻编辑黎烈文接手“自由谈”,一改风花雪月的旧格调,吸引一批进步作家聚集靠拢。鲁迅先生当年以数十个笔名推出大量杂感与小品文,后结集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筑起碑石,光耀史册。与此同时,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瞿秋白、顾颉刚、叶圣陶、唐弢等著名作家、政论家、史学家,也纷纷集结于副刊,竞相绽放笔墨芳香,使景色焕然一新,传为美谈。

报纸分正报与副刊,称“副”并不因其分量“轻”,它所蕴含的文学之美、哲思之妙、知识之丰、生活之趣,实则“千斤”,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新闻记录时代潮汐和社会热度,以“新、奇、快”吸引读者,副刊则通过“定力、温度和缓慢”把读者留住,两者各司其职又彼此辉映。新闻负责把读者吸引过来,副刊则与新闻互为表里,在报业体系中各具功能。副刊以滴水映日、见微知著的方式,涵养文脉,传递新知,为读者提供了陶冶性情的一方家园。



由此想到,《天津日报》副刊的斑斓盛景。以“文艺周刊”为例,在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这个由孙犁先生参与创办的副刊,称其为“文学新人的摇篮”与“著名作家的园地”,实至名归。在漫长的岁月中,编辑与作者之间形成了文化传承、彼此成就的互动关系,编辑不仅是文稿的审阅者,也是作家写作成长的引路者和见证人。许多作家的文学生涯,都是从这里起步,并成为流连忘返的常客。对于基层写作新人,它的挖掘、孵化、扶助功能,同样令人瞩目。作家愿意提供稿件,也是因为副刊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发表平台,并带来了持续的影响力,凝心聚力,互为动力,共同建造质地坚实、风景独异的文化桥梁。

著名作家、编辑大家萧乾先生曾感慨,不少后来享誉文坛的作家,最初都是向报纸副刊投稿,迈出了写作之路的第一步。许多大作家如此,无数普通的写作者也是这样。我的文学启蒙始于阅读,而阅读兴趣多集中在报纸副刊。我的文学口味和阅读情趣,原是被副刊一点点影响的。此后在这条创作之路上虽经历过一个个“驿站”,但副刊的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始终与我一路相伴。

记得早年,我在部队当兵服役,最初在团报道组,负责基层连队的新闻报道,却始终不得要领,交不出满意作业,屡屡让首长失望。后来我迷上了阅读副刊,即使是使命感很强的军中报纸,也在报尾辟有副刊,自成一景,使我逗留其间,乐而忘返。回津后,机缘巧合,我步入了文学期刊的编辑队伍,再读副刊,多了难以尽言的感同身受。《天津日报》的副刊历史悠久、与时俱进、风格多样,“文艺周刊”品牌效应显著,“满庭芳”不拘一格、芳华独具。早些年还有“文艺评论”“七色社会”“文艺观察”等,对我的影响、滋养与托举,此生难忘。它们都曾敞开怀抱,接纳我的稚嫩文章,扶我帮我,让我完成了从副刊读者到副刊作者的角色转变。

很难想象,一份报纸倘若只有新闻,没有副刊,该是何等模样。那仿佛一幅山水,只余下峰峦峭壁、急流险滩,不见了坡上闲花、溪畔茅亭;又像一席盛宴,摆满了浓油赤酱的硬菜,独少了鲜果、新茶与饭后闲话。副刊可以使读者沉淀心绪,感受历史深处的文脉,体察万象纷杂的世态与日常生活的诗意。于方寸版面,以锦绣短章为窗,窥见时代的潜流,岁月的褶皱,雅俗共赏的人文之光。

进入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海量涌现,“流量为王”的逻辑大行其道,博取眼球的语言随处可见,而报纸副刊有一套严谨且成熟的编审流程,拒绝哗众取宠,杂音喧哗。这也是副刊独有的传播属性,无须雷霆万钧的呐喊,没有高头讲章的腔调,不是靶向单一的设定,而是以潜流般的渗透,润物细无声的微光,让读者感受文化晴雨,洞察世态人心,以“慢阅读”的方式,影响一代代读者的认知与审美,共同守护人文底色。

(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一级作家)



左图:《孙犁文集(上下)》(天津日报珍藏版)200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
中图:《天津日报文艺周刊70年精品选(上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出版
右图:《半个世纪的精彩》(文艺周刊散文精选)200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副刊忆往

徐鲁





今年1月2日,我为《文汇报》“笔会”副刊写过一篇散文《刻在心上的故事》。文中主要忆及我少年时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战地”(“大地”副刊前身)上,读到一位景颇族老阿妈因为不识字,用一包干竹叶包着一小段竹根,作为自己入党申请书的故事。这位老阿妈告诉党组织:“竹根代表我的心,用竹叶包起来交给党组织,表示我的心、我的生命,全都交给了共产党。”这个质朴的故事让我过目不忘,近五十年了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这篇散文开头,顺便讲到了自己从少年时开始阅读报纸副刊的经历:少年时在胶东,每到年关,父亲会从集市上秤回几斤旧报纸用来糊墙,把平日里烟熏火燎的屋子糊得四壁如新,亮亮堂堂地迎接新年。这些旧报纸,除了《人民日报》《大众日报》这样的大报,还有一份四开的《大众日报》(农村版),家乡百姓称之为“小大众”。帮父亲糊墙时,我会特意把有副刊的一面朝外,糊到离炕头近的地方,以便随时阅读。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阅读报纸副刊的。

那时候,《人民日报》文艺副刊还叫“战地”,散文、诗歌、杂文、版画、剪纸,应有尽有,偶尔还会刊登带有简谱的歌曲。正处在如饥似渴、求知欲旺盛的年龄,却苦于找不到书本来读,所以我格外“敬惜字纸”,每一面报纸上的文字,我常常读了一遍又一遍,把不少故事和细节真正牢牢记在了脑子里。那位景颇族老阿妈的故事就是这样被我刻在心上的。

青年时代,我是从报纸的文艺副刊起步,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最早的副刊文字,发表在四十年前鄂南出版的《咸宁报》“映山红”副刊上。那时我才十八九岁,在咸宁西河桥边凤凰山下读大学。因为爱好文艺,写了不少习作,开始给报刊投稿。大刊物很难上,《咸宁报》副刊倒是给我刊登了不少诗歌、散文和文艺随笔式的短文。当时编“映山红”副刊的是一位中年编辑,我很感谢他的提携和扶掖。每篇小文章刊登后,报社会开给作者五六元钱的稿费,这在当时,对我这样一文不名的穷学生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到报社领到那几块钱的稿费后,我往往会直奔新华书店。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不少诗集、散文集和外国文学名著,都是用这些稿费买来的。

1983年我毕业后,在鄂南一所县城中学当高中语文教员。这年2月6日,《湖北日报》“东湖”副刊以“东湖新帆”为题,刊发了一辑青年作者的诗,其中有我的一首《清亮的小街》。这期副刊还专门配发了一篇评论,是武汉一位有名的评论家江少川撰写的,其中有几行文字称赞了我的小诗。这年春节刚过没几天,我一走进学校门口,就远远看见一位老教师扬着报纸冲我喊道:“后生可畏,可喜可贺!”

这位老教师名叫罗祖基,后来调到安徽一所大学里担任历史教授,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历史学家。他是山东大学毕业的,受业于童书业、赵俪生等门下,是童书业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在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从事历史研究,性格耿介,最终“因言获罪”,被发配回故乡鄂南当中学历史教员。我在这所中学当语文教员时,和罗老师同在高中部教研室,成了同事。他是资深的历史学研究者,沦落在偏远的小城中学里,郁郁不得志,碰到我这样对他尊重有加的文学青年,惺惺相惜,遂与我成了忘年交。罗老师对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习作虽有鼓励之语,却不忘提醒我说:在副刊上发表的东西,只能叫“豆腐块”,切不可只满足于此,而应该立志去写“大块文章”。

从事写作四十多年来,我在报纸副刊上刊发的各类文字,不计其数。四十多年来与我有过交集的副刊,也实难一一列举。而近二十年间始终保持着温暖友情,迄今仍然经常投稿的副刊大约有十来家,其中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就有《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和“满庭芳”。

熟悉新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文艺周刊”是孙犁和他的战友们进城后创办的。“文艺周刊”出版3000期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长文《荷香清且远——孙犁先生的编辑情怀》。3000期,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孙犁先生在天津日报社一直干到离休,曾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能让他“登上仕版官籍”并“与他终老此生”的,只有副刊编辑这个身份。新中国副刊史上,“文艺周刊”应该有浓墨重彩的一章,这与孙犁大半生都在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

我虽无缘与孙犁那一代副刊编辑前辈交往,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一直是“文艺周刊”的作者。早在1995年,承蒙编辑宋曙光青睐,为“六一”儿童节向我约稿,我投寄了《儿童诗四首》,每首都不足10行。这组小诗在“文艺周刊”刊发后,旋即被上海《儿童文学选刊》选载,还意外地获得了第15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如今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2014年,宋曙光从电视节目上看到,湖北有个小伙子,开了一家名叫“百草园”的小书店,在《最强大脑》节目中凭借记忆力挑战“书架检索”。那时,宋曙光已主持副刊工作,他觉得这个故事很有价值,便让编辑从天津打电话给我,让我有机会去寻访一下这家小书店,写写这个小伙子的故事。之后,我遵嘱寻访了这家小书店,写了一篇《小书店之美》。“满庭芳”用大半版刊登了这篇文章。

这件事使我由衷感佩:身为副刊编辑,他们竟然还能为作者留心发现新鲜的故事素材。后来一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特别温暖和感动。这种编辑情怀,也正是孙犁编辑情怀的传承与延续。

“文艺周刊”和“满庭芳”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看重的文章,长短不拘,灵活采用,只要是生动、鲜活、言之有物的文字,哪怕篇幅长一些,也会视稿件内容和质量,不吝版面。

好的副刊,往往是内容质朴、气韵生动、言之有物、活泼多姿的好文风的提倡者和引领者。副刊文章,最忌华而不实的“悬浮”文风,也应力避不接地气、徒有其表的“文人腔”和充满“AI感”的文字。

1983年,在“文艺周刊”出满1000期前夕,孙犁写过一篇《我和〈文艺周刊〉》,除了谈到他与副刊的因缘,也向副刊编辑提出了几条建议。他认为,办副刊“应该努力办出一种风格来,并用这种风格去吸引作者,影响文坛,招徕好作品”;文艺副刊应该多多“强调现实主义文艺风格,重视有生活、有感受,手法通俗,主题明朗,切切实实的文艺作品”;他还希望副刊编辑,“要经常出去跑跑,联系作者,不要只是坐在桌前,守株待兔”。这些建议,既是孙犁一贯的编辑思想、副刊情怀的表露,也是办好副刊的“题中之义”和宝贵的经验之谈。

(作者系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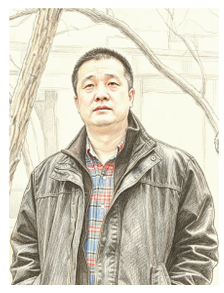
副刊的温度

狄青



我第一次发表文章就是在报纸副刊上,那年我十五岁。老师把那期副刊版剪下来,贴在了学校的公告栏上。同学们争先恐后围读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许多人都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氛围,在我的认知中,那应该是一个由文学期刊与报纸的文艺副刊共同托举起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之后,我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多家报纸的副刊上,并获得了《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参与举办的“关注农民”梁斌文学奖、《北京青年报》全国随笔大赛一等奖、《天津日报》(农村版)“优秀作者奖”等。其中我发表在《天津日报》“满庭芳”上的作品《一条大河的来龙去脉》还入选了“中国2025生态文学榜单”。应该说,我至今没有放下随笔杂文的写作,与我的创作是从报纸副刊上起步有关。我曾在《天津日报》(农村版)副刊先后开设过两个专栏,分别是“人间走笔”与“史事近语”,每周一篇,《天津日报》(农村版)编辑部收到并转给我的读者来信有近百封。为回应热情的读者,编辑还以“狄青印象”为题,在版面上专门向读者介绍我的生活和创作,这令我每每想起,都感到暖意涌上心头。没错,这无疑是来自副刊的温度,它区别于刻意的煽情,而是将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放进版面,让人在多年以后想起依然会为之动容。

或许是因为我与报纸副刊的这种特殊缘分,我对各种报纸的副刊总是比较关注。我发现,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报纸副刊所推动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几乎都得到过副刊的垂青与滋养。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于《晨报副刊》,郁达夫的重要作品《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于《晨报副刊》,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系列散文发表于香港《华商报》副刊,巴金的《激流》(后改名为《家》)是在上海《时报》副刊连载后才交由出版社出版的……而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作为中国现代随笔杂文创作的“重镇”,它的核心作者涵盖了鲁迅、郁达夫、叶圣陶、林语堂、老舍、沈从文、郑振铎、施蛰存等,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70年代末,作家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于《文汇报》副刊,成为“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1981年,青年作家马未都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发表短篇小说《今夜月儿圆》,占据整版,引起很大反响。小说发表后不久,马未都从工厂一线被直接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担任《青年文学》杂志编辑。这样的例子在当代文学史上可以说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副刊的影响之大、辐射之广。



而对于通俗小说家来说,副刊更是重要的阵地。张恨水、宫白羽、金庸、古龙、梁羽生等,都是在报纸副刊连载小说而成名的。在我的眼中,看副刊上的小说连载就像在等一位按时赴约的朋友;而读散文随笔则像是听老友闲谈,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诗歌、书评、游记,则是给忙碌的读者营造出一个心灵休憩的空间。

当然,副刊版面并不仅仅是为了给人慰藉,记录日常。我以为副刊保留必要的辨析、反思、批评,对文化现实、文学现象保持敏锐的判断力也是它的应有之义。我一直认为,报纸副刊区别于很多专业文艺期刊的显著特征,就是它的人民性和普适性。这样的副刊,既能温暖人,也能促使人深入思考。报纸副刊的人民性,说到底就是副刊版面究竟为谁而存在——显然,它不应是专供文人自娱自乐的象牙塔,更不应是一味追逐流量的消费橱窗,它应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扎根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容纳多元声音,同时重视发掘和培养普通作者,亦能满足读者趣味的一方家园。

其实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晋察冀日报》的“老百姓”副刊就要求“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例,从1949年3月24日创刊至今,其内容始终扎根于天津本土文化,记录天津人的生动实践,培养了大量本土业余文学作者,几代天津作家都与它有着不解之缘。

报纸原本是即时的、匆忙的,而副刊却在默默地给读者提供着某种慢,提供着审美与休闲,提供着智慧与识见,提供着一种不必立马给出答案的空间。它往往是人间烟火式的温暖交流,语言鲜活质朴,是不动声色的感染与触发,而不是堆砌辞藻或脱离现实的展示与铺排。就像王蒙先生说的,它应该是“气韵生动”。杂文里的刺、散文里的软、诗歌里的甜、小说里的悲欢,还有历史掌故、往事钩沉、读书闲思、市井见闻、凡人故事、城乡变迁、社区点滴……副刊是团结作者与读者、传承历史与文脉的重要纽带,这就是最直接的“在场”,尤其在当下,副刊更是托起新大众文艺创作不可或缺的一线阵地。

有人说我们如今已经进入“算法”时代,人们往往困在“算法”里不能自拔,大量的时间被“算法”争夺和占据。但正因如此,报纸副刊的存在就更凸显出无可替代的价值,因为它用自身传承多年并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人文算法”,守住了一方“净土”,让那些平凡的生命、普通人的声音、发自内心的表达,能够被看见、被阅读、被记住。

副刊的温度,不是喧嚣时代中的热度与流量,它是一种更贴近人心的存在。它不是快讯,不是指令,而是传统纸媒留给时代的一块可以自由呼吸、谈心,容纳悲喜与真情的所在。而副刊编辑们则在这有限的版面里调配着轻重、雅俗、新旧、动静,建造、守护着一个可供读者阅读、欣赏、交流、思辨的文化空间。在我来看,这或许就是副刊在今天仍然保有其独特价值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文学自由谈》杂志主编)

文艺周刊

第三一〇二期